

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李 强

提要:本文分析了现代化中国道路的认识过程,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到“中国式现代化”,再到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思想,认识到现代化是中国人的长期奋斗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建设,包括了五位一体的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本文总结了现代化道路中国经验的五大方面,即集中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中央的决策机制和严密的各级管理组织)、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全社会对于体制改革的共识、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的产业化城镇化道路,并指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探索的三大方面,即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关键词:现代化 中国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 集中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通过学习总书记讲话,笔者也尝试从社会学界的角度分析一下我国理论界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的认识过程,尝试着总结一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

一、对现代化中国道路的认识过程

作为有着五千多年文化发展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曾经在近代较长一段时间里被抛在了现代化潮流的后面。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如今这样的梦想开始进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

我国社会学界对现代化的认识最初也受到“四个现代化”概念的极大影响。四个现代化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仅从文字表述看,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也于1956年写入了党的八大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1957:4)。当然最初的表述还是初步的和不完全的。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主席在

读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观点(毛泽东,1996:162)。后来根据毛主席的建议,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将四个现代化正式表述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1965:13)。1975年1月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1975:35)。这在当时的局面下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全体中国人的奋斗目标。

1979年后,在中国社会学恢复的初期,中国社会学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怎样实现现代化?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的标准?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现代化,所以只好先从国外的经验中找依据。当年影响比较大的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现代化标准。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演,提出了现代化的11个指标(孙立平,1988:24-25),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学界,而且对于全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11个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5%,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45%以上,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比例70%以上,等等。这些指标在当年看来几乎都是高不可攀的,而今天都已经实现了,有些甚至大大超过了。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就可以结束了?显然不是。今天,当我们实现了这些指标后,反而应更加深刻地反思:中国究竟应该走出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就有深刻思考。他认为应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非雷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由此他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这是对四个现代化认识的深化,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也提出了现代化的量化指标,即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邓小平,1994:237-238)。后来,邓小平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目标亦表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之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15)。小康社会是一种中国人的思考,目前,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的提出,就意味着现代化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发展。

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理论界将我国现代化

建设发展为五大建设的思想,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大大突破了过去的四个现代化的视野,认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产业布局,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是社会的重大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1世纪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又添加了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2015年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对于指导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意义重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笔者有这样几点感想。

第一,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它突出的是一种努力过程、发展过程、建设过程。现代化建设意味着,我们总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和创新没有止境。这样的一种思想,与毛泽东主席关于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论断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1965:6)。

第二,我们开辟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所以国际上谈论的现代化常常以这些国家为模板。迄今为止,所有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种现代化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包括欧洲北美以及澳洲等发达经济体,其特征是工业革命起步较早,经济上是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三权分立,社会上有较长期的市民社会传统,文化上与基督教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欧美模式也经历过长期的矛盾和冲突,曾经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到二战以后才逐步稳定下来。另一种就是二战以后出现的“东亚模式”,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学界也称之为“威权政府转型社会”,其特征是政府更为强势,政府多方面的干预更突出一些,文化上有明显的东亚文化特征,其中日本、韩国是在美国驻军的情况下完成转型的,所以政治体制上显然也有这方面的烙印。在此意义上,中国确实在探索着一条不同于上述模式的现代化的新路,也必然会形成自己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所以,邓小平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原来的经济基础薄弱,属于“后发型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一种“赶超型现代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有

很多自己的创造,总结这些经验会对与中国类似的“后发型”、“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有所启发。比如中国提出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就独具中国特色,再如中国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正在创造具有中国特征的居住方式、出行方式等,创造具有中国特征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第三,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全方位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我国理论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有了极大的飞跃。从前期的四个现代化的认识,发展到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布局的思想,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

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经验

第一,集中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在世界不同模式的比较中,党和政府集中统一管理的能力强大是我们的突出特征。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曾经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结合,在唐宋时期也曾经实现了高水平发展。当然,到了明清时代,中国由于不能跟上现代产业进步的步伐,被现代化甩在了后面。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强大的组织管理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尝试着采用集中权威的管理体制与现代产业生产方式接轨,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是由两方面构成的,其一是党和政府中央集权的决策机制。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都是在中央完成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历程,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中央作出的,包括早期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五位一体的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中央决策的具体过程是先党的中央全会讨论达成共识,然后到下一年的“两会”上由全国来的代表们讨论修改并最后通过。当然,顶层设计从来都是与基层经验相结合的,是与实践层面的“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这也可以表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其二是行之有效的各级管理组织。中国党和政府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非常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层层组织直到最基层的村庄、社区。这样的体制机制在新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没有实现过(黄仁宇,2014:330-331)。现代化建设的指令就是通过这样一套管理机制十分有效地传达至最基层。集中统一的管理机制又得益于土地公有制,可以实现全国总体巨大规模的布局。这也被称为

“举国体制”，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当然，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机制也要注意与市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

第二，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建设。从中央直到基层的严密的组织管理机制从新中国成立就建立了，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会滞后呢？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能否建立密切相关。新中国建立后一度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实施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经济转型，从计划转向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商品市场机制，尝试一部分物价由市场去调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开始尝试全方位的市场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机制、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股指期货等金融信用市场的改革。在这一阶段，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7年中国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功不可没。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社会学角度看，市场的优点是参与广泛，广大老百姓都可以参与。笔者在对地位变迁的研究中发现，在改革以来的几十年里，在所有实现了中产地位的人群中，通过市场经营而进入中产的比例最高，体现了市场的普惠特征。当然，市场机制也有明显特点。其一，纯粹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会造成弱势群体被淘汰的局面；其二，市场也会失灵，会造成许多社会负面效应，如分配不公、高失业率、市场垄断等；其三，市场调节比较缓慢，尤其是遇到经济萧条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行政力量十分强大，在市场发生失灵时常常采取行政调节、行政干预的手段，用政府干预和行政干预来纠偏。

第三，全社会对于体制改革的共识。现代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改变传统体制，而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机制对任何民族都异常困难。中华民族历史上也经历过一部分人想改革而改不动的局面，戊戌变法失败就是一例。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漏洞也很多，民主党的几任总统都想推动医疗体制改革但是推不动，原因就是难以达成共识。所以，如今近14亿的中国人能够认同改革，将改革视为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途径，全体国民形成共同意志、奋力改革实属不易。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共识呢？是因为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给全国人民的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善。笔者曾经有数据调查证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上升（李强，2004：162-163）。所以，任何一项改革都要考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取得全体国民的共识,这是中国深化改革得以推进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心理基础。

第四,开放的政策。中国现代化的改革与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很大程度上是开放带来了改革。1979年以来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实现了赶超。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开放度相当高,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远远超过日本(高柏,2006)。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此后中国经济迅速攀升,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在最近的达沃斯峰会上强调,要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积极主张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西方国家今天却出现了保守主义抬头、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

第五,中国特色的产业化与城镇化道路。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大特征,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在两方面积极推进。中国的贡献是什么呢?这里使用的是“产业化”概念,意味着中国始终是将农业现代化涵括在内的。中国的改革也是从农业、农村开始的,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来推进工业化。事实证明,中国现代化改革从农村开始,农业产量有了极大的提升,产生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体系中来,这是中国工业化能够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工业发展从来没有忽视农村,农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式工业化范例。中国的农业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小农农业走向用现代产业模式运营的集约化农业模式,包括大户统一种植、公司加农户模式、合作社模式等等,创新比比皆是。

中国正在推进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的特点是使用“城镇化”概念,这样城市的发展更具有包容性,更体现多元模式、多层次性。中国现在有城市660个、县城约1560个,另有县以外的建制镇17654个。中国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136个,而美国只有不到10个。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体系极其庞大,城镇化所蕴含的创造集约化经济的潜力极其巨大,将成为带动21世纪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如上文所述,中国政府管理能力强大,在城镇化方面采取了比较强的管控措施,因而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常常发生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即在城市和工业吸纳力还不足的时候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和城市周边,造成社会失去秩序、贫民窟规模巨大等问题。中国城镇化的政府约束政策体现了中国城镇化的“循序渐进”战略。中国城镇化的另一个

特点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即将城市和农村统一起来建设,这也特别体现了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城乡整体建设的特征。

以上总结的这五点,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同时,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原来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亚非拉国家,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会有启发意义。在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实施了后现代化的赶超策略,经济总量迅速崛起,中国人民进入小康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探索

上文已述,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追求是一个努力过程、发展过程、建设过程,我们对于现代化中国道路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所以这也是一种探索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目前在三个领域的探索意义最为重大。

第一,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现代化最重要的三个主体或三大机制,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实现高水平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问题是市场严重缺位,所以造成了经济供给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一体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其突出特征是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较,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实践创新的任务更为艰巨。实际上,市场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样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支撑,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撑,市场经济也难以真正完善,这是我们下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现在市场已经有较大发展,但社会发展却严重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明显地受到了社会发育不足的拖累。目前,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关系中,社会力量最为弱小,社会发育明显不足,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明显滞后。所以,中央多次强调要激发社会活力。怎样激发社会活力呢?这需要广大基层的管理者、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建设中勇于改革、勇于实践。为此,笔者也亲自组织了“新清河实验”(李强,2015)。研究证明,中国的社

会潜力、经济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如果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使每一个老百姓都释放出活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将不可限量。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极大的成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受益面极其广大。根据官方数据,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有7亿多人摆脱贫困(国务院新闻办,2016)。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让群众能更多地参与进来,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让社会有活力。这个活力实际上恰恰是经济改革得以推进的前提。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在2013年11月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的,在随后的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理论界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党提出的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制度执行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建设更加成熟稳定、更加系统、更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整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

如前所述,中国这个巨型人口社会自秦汉以来就依靠集中的国家管理体系运行,近代以来由于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发展滞后了。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就要在制度上创新,使得我们的制度体系真正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此就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现代化的规范和规则,创新与现代化发展相契合的新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是指总的体系,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创造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低成本、高效率、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系列新技术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持。建设这样一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李强,2016)。

第三,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最大优势是巨型人口社会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广大劳动者的努力程度、辛勤程度和追求成功的奋斗心都堪称世界之最,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看到农民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百折不挠、努力奋斗,也颇受感动,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能够加速发展的源泉之所在。现代化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人自身的现代化最为重要。笔者以为,人的现代化包括四个方面:其一,人的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中国的劳动者都能够进入到现代产

业生产和现代职业体系中。其二,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城镇化正在形塑着亿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会具有创新意义。因为欧美的那种高能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与我国巨型人口社会的资源承载力严重冲突,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和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活方式,一种既便利又节约能源和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其三,人的权利、权益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其四,人的文明素质的现代化。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现代化中最为关键的,也是难度最大的。社会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现代化。如果近 14 亿中国人都能成为有理想、有信念、讲道德、守纪律、负责任、有本领的高素质的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中国人也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重。

参考文献:

-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1957,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1975,北京:人民出版社。
- 邓小平,1994,《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高柏,2006,《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国务院新闻办,2016,《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人民网([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1/2016/1017/c1001-28784947.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017/c1001-28784947.html))。
- 黄仁宇,2014,《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
- 李强,2004,《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2015,《清河实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第 8 期。
- ,2016,《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人民日报》1 月 17 日第 5 版。
- 毛泽东,1996,《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孙立平,1988,《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杨 可